

從改革開放到新時代： 中國在經歷怎樣的變化？

如 暉

站在改革開放四十五周年的當口，眼下需要回答的一個重大問題是：中國是否還處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之中？本文給出一個許多人不願意聽到的否定的答案。2012年中共十八大，或更確切地說，2017年中共十九大開啟了不同於改革開放時期的新時代。本文認為，要理解「新時代」的含義，就必須把眼光拉長一些，從計劃經濟時代起步，認清中國現代歷史演進的邏輯。計劃經濟時代是一個「非常態」的時期——「非常態」的含義是，中國社會沒有按照社會的自然演化路徑行進，而是國家建構的對象。其正面作用是快速地進入現代化的軌道，其負面作用是社會的「纖維」被擰斷，且多次陷入危機和混亂。

改革開放的前二十年（1978-1997）和後二十年（1998-2017）具有不同的側重點。前二十年的重心是改革和開放，是國家向社會放權的過程，是對計劃經濟時代的反動。具體而言，就是政治上解放思想，經濟上「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社會上回歸中國傳統。後二十年則是享受前二十年改革開放的紅利，同時向「常態」的發展中國家回歸——「常態」的含義是，政治領域以寡頭政治為特徵，經濟領域以政商聯盟為特徵，社會領域以自由發展為特徵。

新時代的首要任務就是要矯正中國成為常態的發展中國家之後帶來的不良後果，特別是腐敗、官商勾結、黨組織渙散、收入不平等以及過度市場化等現象。完成這些任務需要國家的強力介入，因此新時代具有同計劃經濟時代相似的特徵。但是，新時代能否像計劃經濟時代那樣，成為一個建構的時代？就目前的情形來看，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建構需要一個自治且與實踐相一致的理論，但這樣的理論尚未出現。

一 計劃經濟時代：建構的三十年

計劃經濟時代的主基調是由國家權力主導的建構。這裏的「建構」指的是國家有目標和有組織地對社會實施一系列改造工程。中共從建黨之初就帶有

強烈的使命感，目標是建立一個符合共產主義理想的新中國，而且在1949年取得政權之後開始試圖實現這一理想。中國社會因此偏離兩千年來的自然演進軌道，迅速地邁過現代化的門檻。

中共誕生於五四運動救亡的主旋律之中，是當時的激進知識份子尋找中國的「整體解決方案」的產物^①。中共是繼蘇聯共產黨之後組織最為嚴密的政黨，在奪取政權後迅速開始對中國社會實施由下而上的徹底改造。首先是在城市和農村基層單位建立黨組織，由此控制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政治不再是少數精英的事情，取而代之的是黨的一統天下。社會也不再是一盤散沙，而是被納入黨的日程之中，成為黨實現其宏偉目標的載體。歷史上的中國更多是一個文化疆域，新中國改變了這種局面。由於國家權力通達到社會邊緣，民眾第一次直接而強烈地感受到國家的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共對社會的改造加強了中國的國民認同，因而也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與現代化進程相對應，國家在經濟領域的目標是在最短的時間裏實現工業化。縱觀新中國七十多年的歷史，中國的工業化走了一條先難後易的道路，即先建立重工業基礎和工業體系，然後才轉向消費品的生產。在工業化的初期，缺乏資本是最大的限制條件之一。政府採取了兩個措施來應對這個挑戰：一個是農業集體化。在此之前，中共實施了土地改革，不僅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而且打破了舊中國農民與地主之間的人身依附關係，完成了農村地區多數農民的解放。但是，領導層很快發現，分散的小農不利於資本的快速積累，因而很快放棄了土改的成果，將成千上萬的個體農戶納入人民公社，實行集體生產和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另一個是城市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儘管共產主義理想在其中起到指導作用，但這次改造更為現實的目標是以公私合營的方式實現生產資料的國有化，以便把有限的資源集中到戰略性基礎工業領域。經過農村和城市的這兩次改造，國家得以在全國範圍開展計劃經濟。由此，中國有別於同時期其他多數採取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發展中國家，而更像其東亞近鄰（如日本、韓國和台灣地區），能夠集中資源快速建立工業基礎和相應的科研能力，為日後實行出口導向發展戰略打下堅實的基礎。

在推動工業化的同時，中國在婦女解放、教育和醫療等領域也取得了矚目的成績。在婦女解放方面，中國取消了一夫多妻制度、鼓勵自由婚姻、徹底禁絕了裹腳等殘害婦女的陋習。至今，中國的女性勞動參與率仍然遠高於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水平，而且擁有世界最高的女性創業企業家比例。在教育方面，中國重視基礎教育的普及，到改革開放初期，成人識字率達到65%，高於印度同期二十五個百分點。在醫療方面，中國發起愛國衛生運動，消滅了許多傳染病，建立了基礎醫療體系，從而大大提高中國人的健康水平。到1978年，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達到六十六歲，而印度只有五十四歲^②。

然而，這些成就不是沒有代價的。新中國前三十年所做的基本上都是巨型的社會改造工程，因而難以避免錯誤甚至災難，大躍進以及隨後的大饑荒

是一個顯著例子，文化大革命是另外一個顯著例子。汲取這些失敗的教訓，是中共繼續向前走必須做的功課。撇開這些巨大災難，前三十年的體制本身也存在很大的問題。這種全社會「力出一孔」的體制違背了個人基本的自利性和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短期內能夠見效，長期必然導致經濟的低效、社會的僵化和政治的危機。這在1971年林彪事件之後已經非常清楚地表現出來，政治動盪、糧食歉收、經濟負增長、社會不滿情緒蔓延。鄧小平能夠在1978年較為順利地帶領國家實現轉向，與1970年代的危機，特別是糧食危機有很大的關係^③。

二 改革開放前二十年：「對外開放、對內搞活」

改革開放是對計劃經濟時代的全面矯正。在政治和哲學層面是解放思想，回歸中國的務實主義哲學；在黨的組織層面是繼承中國選賢任能的傳統，建立基於能力的幹部選拔體制；在經濟方面是建立市場經濟，為經濟發展提供微觀動力；在社會方面是放鬆管制，給社會自由發展的空間。

在進入對改革開放時期的討論之前，需要先解決歷史分期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是否要對改革開放時期和新時代進行區分？首先，從純技術的角度來看，改革開放是一個過程，因此總會有一個終點。其次，最為重要、也最為艱難的改革在2001年之前都已經基本完成，過去二十多年事實上沒有甚麼重大改革措施。「改革疲勞症」已經說了十幾年，原因之一是重大的經濟體制改革都已經完成了，剩下來的要麼是小修小補式的改革（更多的實際上是政策的調整，而不是體制改革），要麼是涉及政治體制的改革（因為政治上的原因而無法推進）。給定政治體制不作調整，經濟體制改革可以說基本結束了。再次，新時代的主要任務是矯正改革開放時期產生的問題，和改革開放時期的任務有明顯差別（下詳）。因此，把兩個時期區分開來是必要的。這不是說新時代不再需要改革或不再需要開放，而是說兩者不再是新時代的主要任務。因為改革開放的主基調是「搞活」和「開放」，新時代要矯正前一時期的問題，就必然反其道而行之，提高國家的管控力，並向內用力。從這個角度看，新時代所使用的手段和方法不可避免地要向計劃經濟時代回歸。接受這樣的非線性歷史觀對多數已適應改革開放時期的人來說都相當困難，但歷史本身從來就不是直線進步的。線性歷史觀在西方啟蒙運動之後產生，就其對中國的影響而言，主要是通過馬克思主義的所謂「科學共產主義」灌輸的。

第二個問題是：改革開放時期和新時代的分界點設在哪裏合適？官方把2012年舉行的十八大作為新時代的起點，但是2012至2017年仍然具有改革開放後二十年的許多特徵，而且新領導人定於一尊的格局是十九大之後才形成的，新時代的主要特徵也是在此之後開始顯露形態。因此，把2017年作為改革開放時期和新時代的分界點更為合適。按照這個分期，改革開放持續了

四十年；而這四十年又可以分成前後各二十年，前二十年的特徵是「對外開放、對內搞活」，後二十年是前二十年的展開，其特徵是中國回歸常態，成為一個常態的發展中國家。

中共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採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路線，成功動員底層民眾參與到革命的洪流之中，完成了政權的更迭。在新中國的前三十年裏，階級鬥爭仍然是中共改造社會的工具。改革開放首先要破除的就是階級鬥爭的觀念；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中國不再是一個階級社會。這事實上讓黨放棄了階級鬥爭，同時也放棄了國家的階級屬性，為團結全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創造了必要條件。黨的指導思想回歸實事求是的傳統，後者的實質是中國的務實主義哲學：中國沒有本土宗教，中國人的目標是活好此生；中國務實主義的第一條原則因此是沒有永恆的真理，正如改革開放的第一名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另一方面，在沒有神性指引的情況下，當下的生活充滿不確定性，中國人因而學會了視乎情景而動的哲學：情景不同，目標就不同，而達到目標的手段也會有所不同。用哲學語言來說，就是手段的合法性來自於目的的合意性^④。當然，這樣的推斷不是機械的，而是要用道德和知識進行邏輯分析。

因為有了務實主義哲學傳統的背書，改革才可能得以實施。中共一向重視理論工作，並自覺用理論指導實踐，而改革卻在理論還沒有改動的情況下先行實踐。在這種情況下，很難想像如果沒有務實主義的指導，改革能夠順利推行下去。改革的本質是建立市場經濟，但此前市場經濟被認為是資本主義所獨有的。鄧小平的策略不是直接論證社會主義也可以實行市場經濟，而是把市場經濟當作一種手段，從增強經濟效率的角度來論證這個手段的合法性。他對待開放的態度也是如此：在計劃經濟時代，獨立自主不僅是一種發展經濟的方法，而且也是一個原則；鄧小平不直接挑戰這個原則，而是把開放當作提高效率的手段。他提議建立經濟特區就是從這個角度出發；改革開放後二十年的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時候，他的繼任者也是如此。由於改革開放的確實現了提高效率的目的，市場經濟的合法性得以確立，黨也順勢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儘管學界和社會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涵還沒有形成統一的意見，但已經沒有人再懷疑市場經濟是中國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了。

相較於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的最大優勢是為微觀個體和企業提供激勵。但中國的各級政府也是市場經濟的重要參與者，如何激勵政府官員成為中共面臨的一個重要議題。選賢任能——以能力和德性為標準選拔官員，給予官員充分的激勵，自然成為中共的政策選擇。另一方面，選賢任能是中國古代官僚體制的憲法原則，中共採納選賢任能，也是對中國傳統的繼承^⑤。事實上，改革開放儘管以向西方學習的面目呈現，但就黨所採取的策略而言，回歸中國傳統無疑是改革開放時期的主線之一。這條主線雖然沒有得到官方承

認，但經過較為深入的分析就很容易被發現，務實主義和選賢任能是最好的例證。

國際經濟學和政治學界對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是否具備選賢任能性質有較大的爭論。對於省或高一級官員的研究往往得到不一致的結果。有學者發現，發展地方經濟的能力是官員升遷的一個顯著標準^⑥；也有學者發現個人關係更為重要^⑦；還有學者發現兩者是互補關係^⑧。這些研究可能存在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研究的官員層級太高，這些官員已經歷了多次選拔；而且由於他們更加接近政治中心，因而忠誠而不是能力成為最重要的升遷指標。另一個問題是研究的時期較短，且重合度不高，而過去四十年經歷了多次領導層更迭，黨內的選拔標準勢必發生變化。對市級官員的研究發現，能力是決定升遷的一個顯著指標，而且也得到市場的承認^⑨。另外，針對不同時期的比較研究發現，能力的作用隨時間而下降，而個人關係的作用隨時間而上升；對不同層級的官員的比較研究發現，市級官員的能力更重要，省級官員的個人關係更重要^⑩。總體而言，選賢任能在1990年代表現得最為顯著，本世紀頭十年進入一個模糊的時期，十八大之後個人關係變得更加重要，但這個轉變可能和十八大之後政治和治理模式的轉向有關^⑪，後文還將進一步展開。

「對內搞活」不僅是針對經濟，而且也是針對社會而言的。19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時代，中國社會充滿新鮮的思想，形成了一場「新啟蒙運動」。如果說二十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是救亡的產物的話，1980年代的新啟蒙運動則不帶功利色彩，完全是中國人內心迸發出來的渴望。中國社會由此鬆動，最終醞釀出1989年席卷全國的學生運動。之後，官方希冀用傳統文化來引領社會，傳統節日被恢復，傳統典籍被重新整理，許多地方出現「國學熱」。宗教也得到恢復，「本土的」佛教和外來的基督教同時發展，信教人口達到相當的比例。在一線城市，外國人成為尋常街景，外國人和中國人混居現象普遍。各種民間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其中包括相當數量的外國基金會和商業組織。私人團體無以計數，種類繁多，從驢友社到讀書會，涵蓋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年輕人擇業自主，出國留學成為許多人的選擇。中國人的生活不再僅僅圍繞單位或土地，而是具備了廣闊的空間。

改革開放前二十年是「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二十年，也是完成歷史轉向、回歸中國傳統的二十年。中共的誕生是西風東漸的產物。從1898年戊戌變法到1919年五四運動，中國湧現了難以計數的本土和西方思想，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很小。按照孫中山在國共合作時期的看法，中國沒有實現資本主義，因而不存在資本家和工人的對立，農村中農民之間的差別也不大，所以中國社會不存在階級差別，也不存在階級鬥爭；共產主義完全可以被三民主義裏的民生主義所覆蓋^⑫。如果不是俄國十月革命的刺激，很難想像中國知識份子會選擇馬克思主義這一西方的激進思想。中共外引這一激進思想為立黨原則，對內則以反傳統的面目出現，這讓它更容易集聚新生力量，取得政

權，並在此之後完成對中國社會的改造。但是，這個改造計劃儘管前無古人，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卻沒有撼動中國人的文化根基，中國人的文化心理在接二連三的社會改造運動中保存下來^⑬。改革開放時期中共的任務從改造中國變成建設中國，新的目標迫使它回歸中國文化傳統，以適應中國人的文化心理，從而調動全國人民參與建設的積極性。中共對待中國社會的態度不再是建構和改造，而是順應和適應。

三 改革開放後二十年：中國成為常態的發展中國家

一個典型的常態發展中國家有如下特徵：其一是政治寡頭化，裙帶和庇護政治盛行。發展中國家沒有完成現代化進程，舊世界的家族政治仍然是政治主流，即使是在實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國家，政治也常常由少數家族控制。其他人想參與政治，就必須得到這些家族的庇護，同時為他們提供服務，如財務和政治支持。

其二是普遍存在政商聯盟。發展中國家法治不彰，官員權力不能得到有效的約束，因而商人坐大之後就希冀通過收買官員來獲得壟斷地位，官員也樂於獲得金主支持。由此形成的形形色色的政商聯盟掌控着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命脈，國家的發展受到抑制。

其三是腐敗是社會的常態。在一些國家，官員收取小額賄賂幾乎成為一種社會習俗；在另一些國家、特別是官商勾結嚴重的國家，大型腐敗案件層出不窮。腐敗是發展中國家的「毒瘤」，妨礙了社會和經濟的正常運作。

其四是收入不平等嚴重。國家在發展的初期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人口分化——一些人憑藉財富或知識優勢，或者純粹因為運氣或投機迅速致富，而多數人仍然處於社會的底端——但政府尚沒有能力做大規模的轉移支付，所以收入不平等加劇就成為自然的事情。全球化進一步加劇了各國內部的收入不平等，那些能力較強、且從事和全球化相關工作的人能夠快速提高收入，而其他人的收入則陷入停滯。

計劃經濟時代，上述特徵都被國家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強力干預所抑制。改革開放前二十年，因為以下幾個原因，中國仍然不是一個常態的發展中國家：首先，中國當時在經歷全面轉型，整個社會在急劇的變化過程之中，尚不足以形成穩定的政商聯盟；其次，私人資本剛剛起步，沒有形成干預政治的規模；再次，大規模的城市開發尚未開始，大型腐敗案件較少；最後，人口分化尚不充分，外向型經濟尚未形成全國性的態勢。這些條件之所以在改革開放後二十年逐漸成熟，是因為社會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一方面，加入WTO之後，中國進入高速增長的時期，財富急劇膨脹，既加劇了收入不平等，也為腐敗提供了溫牀；另一方面，黨內和中國社會不再對改革有共識，重要的改革都已經完成，整個社會可以舒適地享用改革的紅利。剩餘的改革

都涉及根本性的政治體制問題，在高速增長的背景下，這些改革並不是急迫的問題。由此，中國進入了回歸發展中國家常態的時期，其表現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中國的基尼系數從1990年代末之前的0.40急速上升到2007年的0.47或以上^⑭，中國由此進入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國家之列。收入差距的主要組成部分是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行業差距。城鄉差距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達到最高峰，並一直維持在高位；地區差距擴大較多，主要原因是沿海省份採取外向型經濟，收入水平比內陸地區增長較快；行業差距也有所擴大，原因是與開放有關的行業收入增長較快。

第二，腐敗迅速蔓延。儘管過去也有腐敗案件，但所涉金額一般比較小；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腐敗案件不僅數量激增，而且金額大幅度上升。大型腐敗主要和資源、土地開發以及政府審批相關。比如，山西是煤炭大省，各級官員紛紛把手伸向煤炭開發，而煤炭公司老闆也樂得在政府內部找到靠山，因此出現所謂的「塌方式」腐敗。再如，山西商人丁書苗通過賄賂當時的鐵道部長劉志軍，壟斷鐵路貨運，坐地起價，收受大量回扣。在很大程度上，這些腐敗是中國乘上經濟高速增長這趟列車之後才發生的。研究發現，反腐開始之後，過去經濟表現好的官員更容易落馬；這些官員自恃發展地方經濟有功，把私人老闆的賄賂當作自己應得的報酬^⑮。

第三，中共權力碎片化。用「碎片化的威權體制」來描述改革開放後二十年的中國政治體制是最恰當不過了。在基層，政府的商業化傾向嚴重：一方面，政府的主要工作是招商引資，運作方式如同一間有限責任公司；另一方面，政府官員也形成了「在商言商」的風氣，為腐敗的蔓延提供了社會氛圍。地方黨的作用因此被大大弱化。在中央，黨的集體領導遭遇瓶頸：一方面，退休領導退而不休，繼續干涉在任領導的工作；另一方面，中央常委各管一攤，不僅政策實施失去了方向，而且埋下內亂的種子。集體領導不能沒有一個主要領導，否則就可能陷入無領導甚至解體的狀態，鐵托（Josip B. Tito）之後的南斯拉夫就是一個例子。

第四，政商聯盟興起。「政府俘獲」（state capture）幾乎是所有國家的通病，而發展中國家尤甚。商人俘獲政府有兩個目的，一個是讓政府官員為自己服務，另一個是通過控制官員來控制地方或全國的政治，培植自己的代理人。由於歷史原因，中國的許多商人還有一個「胡雪巖夢」，深受「學而優則仕」的影響，希望「商而優則仕」，不僅要成為商場的主角，而且要成為政壇的主角。一些官員甘於被圍獵，成為商人在政府的代理人；另一些官員為鞏固和擴張自己的權力範圍，主動找到富有的商人結成聯盟，和商人形成庇護關係。中共權力碎片化為形成這樣的政商聯盟提供了條件，而它們又進一步推動了權力碎片化。

第五，過度市場化。自1993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後，中國進入一個快速市場化的進程，由此帶來了經濟和社會的空前繁榮。計劃經濟是一種

管制經濟，市場化反其道而行之，是放鬆管制的過程。然而，放鬆管制到甚麼程度，直到今天仍然是未定式，各種市場化的探索應運而生，在一些人的眼裏，其中一些帶來了不良後果。比如，民辦教育和教培行業興起，為民眾帶來更多的教育選項，但許多民辦教育機構帶有很強的逐利目的，讓一些家長、學生感覺不適，在一些地方也的確擠壓了公辦教育，提高了民眾接受基礎教育的成本。再如，2012至2018年興起的「影子銀行」推動了中國金融的發展，但因為監管滯後，也產生了一系列嚴重問題。金融領域成為腐敗的重災區，也是政商聯盟最為猖獗的領域，同時也「養肥」了一些掏空中國的「碩鼠」。市場是社會的一部分；在一個合意的社會裏，市場應該受到社會目標和習俗的約束。過度市場化終究會造成社會的反動，我們將看到這個反動在中國是由國家主導的。

中國成為常態的發展中國家，是改革開放前二十年思想解放和社會轉型的結果。改革開放終結了計劃經濟建構的時代，結束了國家對社會的強力干預，中國社會回歸它曾經中斷的自然演進路徑。儘管黨仍然在各個方面掌控着局勢，但它對社會的控制明顯減弱。中國仍然是一個走在現代化道路上的發展中國家，當國家對社會的管控有所鬆動的時候，回歸發展中國家的常態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儘管這個常態帶來上述一系列的問題，但就社會和個人的選擇空間而言，它延續了改革開放前二十年所取得的成績，而且在許多方面進一步擴大了個人和社會的自由。這也是當新時代來臨的時候，整個社會都感到不適的原因。

四 新時代：新在哪裏？

改革開放後二十年所積累的問題，不可能被所有人容忍；對於那些偏向相信國家能力的人而言，這些問題的危害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新時代的首要任務就是要矯正這些問題。儘管按照歷史分期，新時代從十九大才開始，但許多措施在十八大之後就開始實施了。

新時代的第一項任務是反腐。儘管十八大之前也反腐，但把反腐當作運動來實施，是十八大之後的事情。從十八大到2021年6月，全國紀檢監察機關立案審查的案件達到385萬件，查處408.9萬人，374.2萬人受到黨紀政務處分；從十八大到2022年中共二十大，紀檢機關共立案464.8萬餘件，其中審查、調查中管幹部（中央組織部直接管理的幹部）553人，處分廳局級幹部2.5萬多人、縣處級幹部18.2萬人^⑩。換言之，反腐十年，被審查、調查的幹部達到全國黨員人數的5%。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反腐的首要目的是純潔幹部隊伍，但同時也是改變國家治理模式、確立新領導人權威的手段。改革開放時期，發展經濟是首要任務，中共對幹部的管理以能力為標竿，對幹部的其他方面採取了放任的態度，腐敗因此成為官場文化的組成部分。十八大之

後，新領導人矢志改變這種狀態，願意以犧牲選賢任能為代價來提升黨的純潔性，反腐是完成這個轉變所必不可少的環節^①。

然而，經過十年的反腐運動，腐敗仍然無法根除。2023年上半年紀檢機關處分了25.8萬人^②，數量超過反腐十年的平均數。腐敗在發展中國家近乎是一種文化，根源在於古代社會對權力的一個赤裸裸的認識：權力的唯一目的是用來換取個人利益——中國也不例外。一旦回歸發展中國家的常態，腐敗就不僅要回歸，而且極其難以根除。社會科學家至今沒有一個公認的關於腐敗如何消失的理論，但有一點似乎是肯定的：世界上尚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僅僅通過制度建設根除腐敗。許多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前英國殖民地國家）擁有完備的法律制度，但腐敗仍然司空見慣。高薪可能是防止腐敗的一個有效手段，但薪水必須遠超社會平均水平、且達到一定的數額才可能達致目的（如香港和新加坡首長的薪酬標準）^③。中國的法治水平仍然較低，而高薪養廉既沒有物質基礎、也沒有政治基礎，因此以運動的形式反腐可能還要持續一段時間。

新時代的第二項任務是解決黨組織的碎片化問題。在這方面，中共主要實施了三個措施：一是強調黨的集中統一領導。黨不僅掌管政治決策和官員任命，而且掌管經濟決策；二十大之後，黨在經濟決策方面的作用進一步加強，國務院成為一個執行機構^④。二是建立領導人的絕對權威。201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取消了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使之與黨總書記的任期相一致，解決了總書記一旦任期超過兩屆，黨與國家權力就會不一致的問題。在此之後，領導人的論述成為黨和各級政府幹部必須學習的內容，目的是統一全黨的思想，推進新時代的工作。三是實行上級對下級的定期巡視。這些巡視內容不斷增加，一開始是以反腐為主，而後加入政治巡視，最後更是擴大到下級單位工作的各個方面。巡視固然可以發現問題，並起到警示作用，但更為重要的是貫徹中央和最高領導人的意志，讓全國上下成為「力出一孔」的精密「戰艦」。

上述措施基本上實現了政策制訂者的初衷，但也帶來嚴重的問題。一是各級政府官員喪失了做事的自主性，由此也喪失了做事的積極性。更壞的是，一些官員揣度上級的意圖，有意採取一些可能讓上級高興、但損害整體經濟或社會利益的措施。二是為避免競爭者挑事、打小報告，官員做事變得謹小慎微，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規避風險。比如，為避免受賄嫌疑，官員在政府採購中寧肯把項目發給沒有專長的國有企業、聽任它們再分包給民營企業，也不直接發包給民企，從而造成事實上的「國進民退」。結果是，「躺平」不僅成為許多官員的常態，也成為中國經濟的常態。更為嚴重的是，長此以往還會產生第三個問題，即黨內政治生活回歸改革開放之前的狀態，說假話、做假事、同事之間相互提防成為常態。如何平衡黨內的統一以及各級政府和經濟的活力，是新時代必須解決的一個問題。

新時代的第三項任務是打破政商聯盟。利益集團政治、政商聯盟和政府俘獲是阻礙國家發展的頑疾，它讓政府失去自主性，或成為少數人的工具，或分崩離析。走向常態的發展中國家之後，中國也出現了同樣的傾向。這顯然與新時代的追求相背離，打破政商聯盟勢在必行。但要打破政商聯盟，除了要清除黨內的腐敗份子之外，還必然觸碰到一些商人的利益，甚至會影響一些行業的發展。過去幾年金融、地產和平台經濟領域所受到的衝擊，都與此相關。在這個過程中，許多民企成為相關整頓措施的犧牲品，而中國經濟也受到傷害。這讓一些人認為，黨的目標就是要壓縮甚至消滅大型民企。然而，二十大之後整頓告一段落，黨開始推出一系列鼓勵民企和平台經濟發展的文件，表明其目標不是消滅大型民企，而是要消除它們形成政商聯盟的政治基礎。一些民企受到打擊，是根除政商聯盟以及其他一些整頓措施（如對過度金融化和房地產過度發展的整頓）的副產品；黨對民營經濟的態度沒有改變。但是，經過這些年的整頓，民企的信心大降，只靠中央發幾個文件難以改變這種狀態。黨必須進行全面的創新，給出確保中國政治、社會和經濟長治久安的理論和實踐方案，才能夠穩定民企和廣大中產階級的信心。

新時代的第四項任務是糾正過度市場化帶來的問題。市場帶來繁榮，但並不是所有市場的結果都符合社會目標，在中共領導下的中國更是如此。中共是一個具有強烈使命感的政黨，造就平等社會是其使命之一，這就必然決定了它不會容忍市場的過度發展。改革開放時期，市場被當作提高效率的手段，市場的負面作用被暫時擱置；新時代到來之後，矯正市場的負面作用被提到黨的日程上來，金融和教育領域是兩個典型的例子。

金融領域的整頓始自中國人民銀行等監管機構在2018年4月27日頒布的〈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①，初始目的是規範影子銀行的發展，隨後發展到對P2P（點對點網絡貸款）行業的整頓、金融反腐和金融從業人員的降薪。相對於金融市場出現的亂象，這些措施是有必要性的，而且也取得了很大的效果，但力度過於猛烈，對經濟和社會造成遠超出預期的衝擊。由於影子銀行規模驟降，高度依賴影子銀行融資的PE（私募股權投資）和VC（風險投資）公司資金短缺，中國的VC融資總量與美國同期總量的比例，從近90%跌至40%；A股市場上幾十家民企因為資金鏈斷裂而被國企收購，股市一片哀鴻，直接融資比例下降；P2P公司大量倒閉，無數民眾血本無歸。

在教育領域，整頓以打擊校外教培行業為先導，波及到基礎教育階段的所有民辦學校。教培行業符合民眾的需求，但也有成為與K12（六年小學、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基礎教育體系並行的校外補習，甚至替代體系的危險；基礎教育體系大量存在的民辦學校在豐富民眾選擇的同時，也存在降低教育公平性的風險。對這兩個領域進行規範是應該的，但自2020年以來，規範變成了整頓，甚至強制性關閉，結果適得其反。表面上看，教培機構都關閉了，實際上是化整為零，從機構培訓變成了家庭教師個體培訓，校外教培價格高

漲，成為少數家庭能夠支付的服務，教育變得更加不公平。另一方面，基礎教育體系硬性規定民辦教育學生規模不超過全部學生的5%，許多民辦學校不得不關閉，導致公立學校人滿為患，教學質量下降。

從對經濟和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來看，對過度市場化的矯正顯然走過頭了。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官僚系統在措施落實方面的層層放大，這是集中統一領導和定期巡視的負面後果之一。各級官員為了表示忠誠，理性的選擇就是過度執行上級的指示，等政策落地的時候，就一定會變成蠻幹。這不僅表現在過度市場化治理方面，在經濟的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一個例子是對房地產的調控。中國在新冠疫情初期的防疫措施比較成功，因而經濟恢復較快，房地產業也隨之恢復，到2021年春天達到頂峰。此時，決策者又開始擔心房地產過熱問題，執行部門很快出台房地產的「三條紅線」（剔除預售款之後的負債率不得超過70%，負債不得超過淨資產，現金—短債比不低於一倍）以及對銀行房地產信貸的限制措施，意在遏制房地產企業的信貸增長。結果，房地產業從此以後一路下滑，直到今天仍然沒有停止。2023年第二季度之後經濟復蘇乏力，與房地產業的下滑有很大關係，因為房地產業具有超強的前後向聯繫，它的下滑極大地抑制了消費需求。

新時代的第五項任務是消除貧困、實現共同富裕。從改革開放開始到2010年，中國的減貧業績全世界有目共睹。為實現小康目標，十八大之後減貧的力度大大增加，到2021年，政府宣布消除了絕對貧困。之後，黨提出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這本來是順理成章的好事，但由於官方文件提出「第三次分配」的概念，而一些老左派又趁機提出「民營企業退場論」，企業家和其他有產者因此擔心財產安全，社會上議論紛起，作為政策制訂者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不得不召開記者會專門予以澄清。之所以會到如此的地步，源自於黨缺乏關於市場經濟條件下推進共同富裕的理論，無法說清共同富裕以及保護產權和市場原則之間的關係。但這樣的理論是可能的，儒家和西方溫和的左翼自由主義都提供了有效的思想資源^②。

新時代並不意在否定改革開放，但它所採取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與改革開放時期的方向相悖的。各級政府官員不再擁有自主決策的空間，經濟活動受到約束、活力下降，社會空間被壓縮。三年疫情，特別是2022年期間的「清零」政策更是讓這一切雪上加霜，許多人因此選擇移民海外，在華外國人也紛紛離開。以改革開放時期作為參照，新時代無疑是向計劃經濟時代的回歸。

然而，靜下心來冷靜地思考，這可能是歷史規律使然。施特勞斯(William Strauss)和豪(Neil Howe)在1990年代中期寫的《第四次轉折：世紀末的美國預言》(*The Fourth Turning: An American Prophecy—What the Cycles of History Tell Us about America's Next Rendezvous with Destiny*)也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個規律^③。兩位作者在這部著作中認為，美國歷史存在八十年的歷史大循環，每個循環又包括四個時期：高潮期、覺醒期、展開期和危機期。在高潮

期，社會進入一個新的大循環，國民接受新的共同價值觀以及未來的共同目標，生活水平上升，社會欣欣向榮，情緒高漲；美國1945至1963年處於這個時期。接下來的覺醒期對共同價值提出挑戰，人們試圖尋找新的價值體系；1964至1983年是美國的覺醒期，民權運動、性解放和反戰運動交織在一起，接着是在越南戰爭中的失敗，美國經歷了二戰後最為動盪的二十年。再下來的二十年是美國的展開期，社會失去了方向，覺醒期裏產生的各種社會思潮都在展開、試探自己的極限和可及的範圍。兩位作者寫作此書時正處在展開期，他們預測展開期將在2005年左右結束。現在看來，他們的預測是準確的。

2004年，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發表他的最後一部著作《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該書提出甚麼是美國人、甚麼是美國文化的世紀之問²⁴。回頭看來，這一問不僅是對1960年代之後美國共同價值觀走向解體的追問，而且也為特朗普(Donald J. Trump)的出現奠定了理論基礎。接踵而至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及由此引起的美國的衰落感，似乎就是為接下來的危機期預備好的歷史安排。可怕的是，施特勞斯和豪發現，每次危機期最終都以「全面戰爭」結束：最近一次是美國參與世界大戰，再往前一次是美國發生內戰。那麼，下一次呢？如果兩位作者的預測再次正確的話，美國將於2025年結束危機期，距離現在只有兩年的時間。美國會因為2024年的選舉進入內亂嗎？抑或會對外參與或發動一場戰爭？

與本文相關的是，這一歷史循環論應用到中國當代歷史也是非常恰當的。新中國成立是中國最近一輪大循環的起點，隨後的高潮期比較長，到1976年結束。這是毛澤東的時代，它的樣板是在1950年代奠定的，那時剛剛誕生的新中國充滿活力，社會主義理想深入人心，全國上下一心，各項建設欣欣向榮。大躍進之後，社會進入動盪期，林彪事件之後，消極情緒開始在全國瀰漫。這為1977至1997年的覺醒期(中國人更為熟悉的說法是「思想解放時期」)奠定了基礎。這二十年是鄧小平的時代，基本上對應本文所定義的改革開放前二十年。改革開放後二十年是展開期，中國回歸常態的發展中國家既是覺醒期產生的各種可能性展開的結果，也為這樣的展開提供了條件。新時代對應於施特勞斯和豪所說的美國的危機期，都是要解決覺醒期以來積累的問題。但中美解決問題的方式不同：美國的政治結構決定了危機期的總爆發是不可控的，而中國的政治結構決定了國家會在可控的範圍內解決問題；新時代不是中國的危機期，而是一個矯正期。新時代的主政者認為，儘管改革開放的成績是偉大的，但與之相伴隨的問題不可容忍，必須進行一次全面的矯正。對於習慣於改革開放帶來的「進步」的中國人而言，這注定是一個痛苦的過程。

歷史不是線性的，而是有許多的迂迴。人類的天性決定，如果沒有一股回拉的力量，社會就會在一個方向上一直走下去，最終要麼走向僵化，要麼

走向崩潰。歷史就是在衝動的力量和回拉的力量作用下彎彎曲曲地走到今天的。當衝動的力量佔據主導地位的時候，人的天性被充分釋放，個人既可能活得自在——如北宋仁宗時期，也可能活得悲慘——如魏晉時期；當回拉的力量佔據主導地位的時候，人的天性受到抑制，個人既不會太自在，也不會太悲慘——如清代乾隆時期。但歷史不會顧及個人的感受：當關鍵時刻到來的時候，歷史就會找到它的代理人，實施自己的「預定計劃」。

五 結語

從改革開放到新時代，中國經歷了從放鬆管制到加強管制的過程。從「新時代」的名稱就可以看出，執政者具有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希冀在未來十年、乃至更長時間裏建構一個新的中國。然而，無論是從歷史規律，還是從中共的政策選擇來看，新時代都不太可能成為像毛澤東時代那樣的一個建構的高潮期。從歷史規律來看，新時代的主要任務是矯正改革開放時期積累的問題，這個任務本身就非常繁重，不可能在短期內完成：一方面，經過四十多年的浸淫，多數中國人，包括廣大的官員群體，已經適應了較為寬鬆的經濟和社會環境，無法充分理解和應對新時代的矯正工作。另一方面，過去幾年裏快刀斬亂麻式的做法產生了嚴重的後遺症，影響到民眾對黨的信心；把民眾和黨重新凝聚起來，恐怕需要很長的時間。更為重要的是，黨本身也沒有準備好進入一個新的建構時代。

毛澤東時代的建構有現成的理論可循，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新時代沒有這樣的理論。改革開放已經牢固地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地位，而市場經濟和馬克思主義是無法兼容的。然而，黨的官方理論仍然停留在馬克思的學說，遠遠落後於改革開放的實踐。新時代不是要否定改革開放，而是要揚棄改革開放的缺陷，完成中國螺旋式的上升。因此，新時代急需創建新的理論。然而，馬克思主義是中共的建黨學說，放棄馬克思主義會招致黨的合法性問題。黨的態度是鼓勵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希望通過理論創新，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共的實踐相結合、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但迄今為止，鼓勵措施不僅沒有收到多少效果，而且適得其反，大大強化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存在。根本原因在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馬克思所構想的未來社會，因而需要大膽的創新，包括放棄很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如階級理論、資本理論、報酬理論等。但黨的正統理論家不僅沒有放棄這些理論，而且還在使用其中一些理論來說事。比如，過去幾年出現了「資本無序擴張」的說法，馬克思的資本理論被再次拿出來作為整頓資本的理論武器，結果導致企業家和有產者人心惶惶，一些人抓緊時間轉移資產和移民。新時代並不是要回歸計劃經濟時代，但落後的舊理論讓人不得不聯想到計劃經濟時代。

總體而言，中國社會還沒有找到一個確定的方向，一些關鍵性的理論問題尚無定論。比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否已經結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該是一個怎樣的制度形態？在其中，民營經濟佔據甚麼樣的地位？資本是否應該獲得回報？比這些問題更為根本的是，中共體制是否要重建自己的政治哲學？2000年提出的「三個代表」（中共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以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早已宣告馬克思以階級為基礎的國家理論過時了，但是黨至今沒有產生新的國家理論。改革開放的經濟成就是黨的合法性的一個構件，但這種「倒着講」的功利主義論證不足以獲得持久的哲學合法性，黨還需要一個「正着講」的哲學論證。「正着講」就是要從人性和國家治理要求出發，說清楚黨存在的哲學基礎。要完成這樣的講法，唯一的路徑是回歸中國，創造與「人民群眾日用而不覺的共同價值觀念」^⑤相一致的理論。這是一個宏大的主題，超出了本文的範圍，但這樣的路徑是存在的^⑥，只是需要拿出十二分的勇氣，與舊理論決裂，全身心地擁抱中國的優秀政治傳統。

註釋

- ① 林毓生：〈二十世紀中國的反傳統思潮與中式烏托邦主義〉，載許紀霖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論》，上卷（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0），頁466-70。
- ② 姚洋：〈中國現代化道路及其世界意義〉，《國家現代化建設研究》，2022年第3期，頁17-31。
- ③ Dali L. Yang,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te, Rura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amin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44-79.
- ④ 姚洋、秦子忠：〈中國務實主義及其儒家哲學基礎〉，《文史哲》，2019年第5期，頁69-89。
- ⑤ 貝淡寧 (Daniel A. Bell) 著，吳萬偉譯：《賢能政治：為甚麼尚賢制比選舉民主制更適合中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蘇力：《大國憲制：歷史中國的制度構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頁393-441。
- ⑥ Hongbin Li and Li-an Zhou,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 no. 9-10 (2005): 1743-62.
- ⑦ Victor Shih, Christopher Adolph, and Mingxing Liu, "Getting Ahead in the Communist Party: Explaining the Advancement of Central Committee Members in Ch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6, no. 1 (2012): 166-87.
- ⑧ Ruixue Jia, Masayuki Kudamatsu, and David Seim, "Political Selection in China: The Complementary Roles of Connections and Performanc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3, no. 4 (2015): 631-68.
- ⑨ Yang Yao and Muyang Zhang, "Subnational Leaders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 no. 4 (2015): 405-36; He Wang, Yang Yao, and Yue Zhou, "Markets Price Politicians: Evidence from China's Municipal Bond Markets",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vol. 122 (September-October 2022), <https://doi.org/10.1016/j.jeconbus.2022.106083>.

- ⑩ Zhaoguang Wang, Yang Yao, and Junni Zhang, "The Competence-Loyalty Tradeoff in China's Political Selectio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50, no. 2 (2022): 369-93.
- ⑪⑫⑬ Tianyang Xi, Yang Yao, and Qian Zhang, "Building a Clean and Loyal Stat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23).
- ⑭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上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頁34-49。
- ⑮ Edward Friedman, Paul G. 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68-76; Zhi-An Hu, Yang Yao, and Wuyue You, "Social Embeddedness, Local Officials, and China's Great Famine" (January 2023), <https://nsd.pku.edu.cn/docs/20230104135031717230.pdf>, 7.
- ⑯ 程永宏：〈改革以來全國總體基尼系數的演變及其城鄉分解〉，《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4期，頁45-60；李實、羅楚亮：〈中國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對修正樣本結構偏差的嘗試〉，《經濟研究》，2011年第4期，頁76。
- ⑰ 〈中紀委：十八大以來已查處408.9萬人，392名省部級以上幹部被查〉（2021年6月28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3785312883035124&wfr=spider&for=pc>；〈中紀委：十八大以來立案審查中管幹部553人，處分廳局級、縣處級幹部人數公布〉（2022年10月17日），<https://export.shobserver.com/baijiahao/html/539798.html>。
- ⑱ 〈2023年上半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處分25.8萬人〉（2023年7月22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2071652021732224&wfr=spider&for=pc>。
- ⑲ 香港行政長官的年薪約為500萬港元，是香港人均GDP的十多倍；新加坡總理的年薪為220萬新元，是新加坡人均GDP的二十倍。
- ⑳ 二十大之後新一屆國務院領導班子上任後修改了〈國務院工作規則〉，李強總理強調，國務院要「當好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的執行者行動派實幹家」。參見〈李強主持召開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強調 當好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的執行者行動派實幹家 在新的起點上推動各項工作開好局起好步〉（2023年3月18日），中國政府網，www.gov.cn/zongli/2023-03/18/content_5747394.htm。
- ㉑ 這個文件後來簡稱為〈資管新規〉；它對金融機構的影子銀行業務進行了詳盡的規定，目的是規範和限制影子銀行業務的發展。參見中國人民銀行等：〈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銀發〔2018〕106號）〉，中國人民銀行辦公廳網，www.pbc.gov.cn/tiaofasi/144941/3581332/3730258/index.html。
- ㉒ 姚洋：〈儒家與共同富裕〉，《孔子研究》，2023年第2期，頁5-11。
- ㉓ 以下內容參見William Strauss and Neil Howe, *The Fourth Turning: An American Prophecy—What the Cycles of History Tell Us about America's Next Rendezvous with Destiny* (New York: Three Rivers Press, 1997)。
- ㉔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
- ㉕ 參見〈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鬥——習近平同志代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的報告摘登〉，《人民日報》，2022年10月17日，第4版。
- ㉖ 姚洋、秦子忠：〈甚麼是中國社會主義？〉，《文化縱橫》，2023年6月號，頁45-58；《儒家政治》（北京：中信出版社，待刊）。